

朱大渭著

六朝史論



中华书局

六朝史论

朱大渭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朝史论/朱大渭著. —北京:中华书局,1997. 8

ISBN 7-101-01637-5/K·729

I. 六… II. 朱… III. 古代史-研究-中国-六朝时代-文集 IV.
K23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1114 号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8½印张·425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8.00 元

序

朱大渭君在五十年代初期肄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从余受学，勤敏朴实，成绩优异。毕业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攻魏晋南北朝史，仍常与余通书论学，并寄示其所发表之作品。三十余年中，朱君勤苦殚研，学诣精进，论著宏富，驰誉士林，已提升为研究员，兼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可谓不负当年之所期许者矣。今朱君哀集其研治魏晋南北朝史之论文二十二篇，名曰《六朝史论》，将刊行问世，驰函乞序。余以数十年师生之谊，义不容辞。

朱君在所撰《治史刍谈》中，自述治史之心得经验，综括为三端：一曰“学习和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二曰“必须详细占有和准确识别资料”；三曰“贵在求真和创新”。所述三端，均属实录，而求真与创新尤为关键所在。惟其有求真创新之精神，故能博览群书，兼采众说，虚心体会，汲取菁华；而又能不囿成规，独辟新径，义据通深，自标创见。朱君治学之求真创新精神体现于本集二十二篇论文之中，综其特点，厥有两端。

一曰开拓领域，增新课题。近数十年中，前辈学者研治魏晋南北朝史，成绩显著。建国以还，治史者多致力于土地制度、农民起义、民族融合、人物评价等重要课题，其余方面，殊少涉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海外汉学家（包括华裔学者）研治魏晋南北朝史者，所涉及之方面远较内地为广阔。朱君慨然发

愤，思补此缺，于是在文献与考古资料中勤搜博采，殚心精思，对于魏晋南北朝时之官俸、官员致仕、政界名人年龄结构、套城、外科医术、北朝畜牧业等，各种新课题，均撰写专文，加以阐论；即史学界一向研究较多之问题，如农民起义、民族融合、阶级结构、评价诸葛亮，等等，亦撰写专文，提出新解。朱君生平服膺陈寅恪先生之言：史学研究，“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域，补前修所未逮”（《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本集诸文，能开拓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之新领域，即遵循陈寅恪先生启示之实践也。

二曰考证精密，识解创新。朱君治史所提出之新见解，绝非公式化之空谈泛论，而是在对大量资料之搜集、审查、考证后而独立思考之所得。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说：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

朱君治学正是遵此而行。兹举数例以明之。一、论文集中《魏晋南北朝阶级结构试析》一文，将魏晋南北朝时之阶级结构细加爬梳，分为六个阶级、三个等级（贵、良、贱），并说明其间之相互关系，对“士庶之别”一辞之涵义作出明确解释，使当时极为繁复之阶级结构得以明朗。二、东晋南北朝时，北方战乱频仍，而国家领民增殖，南方局势稳定，而领民反减少，其故何在？朱君论《魏晋南北朝南北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一文解答此问题。盖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执政，中央集权加强，突破魏晋以来汉族政权之统治模式，限制豪强大族私家荫户，北朝各代括户仅有数字可查的户数，便为南朝总户

数的百分之一百七十八；而东晋南朝则私家荫户增多，突出之例，如刘宋大明时，私家荫户约为国家领民之二倍。此即是其症结所在。三、官俸与官员致仕问题，以前治魏晋南北朝史者致力甚少，几成空白。朱君特撰两文，加以考索。论《两晋南北朝的官俸》文中，经过精密之排比核算，考知两晋南北朝各时期各品级官俸之确数或概数，而推断出，“官阶愈高，官俸愈丰”，各品官俸差额也是“官阶越高其差额越大”，且高级官俸与低级官俸悬殊甚大。在《两晋南北朝官员致仕刍议》文中，考出魏晋南北朝时官员致仕年龄，并非均按“七十致仕”之古制而是情况极为复杂，且致仕后之待遇，官品愈高，俸禄恩赐愈厚。此两文不仅对于研究魏晋南北朝官制者提供精确之数据参考资料，且揭发出当时官员之特权。四、《魏晋南北朝政界名人年龄结构剖析》一文亦是新课题。文中据八十三人之事例细加考核，对于其入仕年龄、任要职年龄、建立功业年龄、仕途终龄等，均推算出平均数字，用力勤细。五、魏晋南北朝时外科医术有突出之发展，而以前治史之士鲜有加以研寻者。朱君论《魏晋南北朝的中医外科医术》一文谓，此时期战乱频仍，人民陷于饥荒、疾疫之中，故救死扶伤之医药学发展迅速，外科尤为显著。当时医学有明显之分科，而外科医书有十余种，华佗麻沸散尤为伟大发明。考诸史籍，发现外科医术十二例，十一例取得成功。朱君此文可为中国医学史提供重要资料。以上五例，仅举其要，至于朱君论文集其他创获，读者可自得之。朱君诸论文中，借鉴西方治学方法，在研究某种历史事件或现象时，常用排比统计之术，求得有关之数据，予读者以更准确之认识与依据，此亦其研究方法之一特点也。

自来论中国古代史者均推汉、唐为盛世，而唐代之昌盛尤胜于汉，此固然矣。治史者又或谓，魏晋南北朝四百年乃战乱割据之世，虽承汉开唐，但在历史发展中，其地位似属次要。窃以为此亦皮相

之谈，非笃论也。如以通古今之变之眼光综览全史，则可察知，唐代所以昌盛之诸种因素多孕育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苟无魏晋南北朝时期之积蓄酝酿，则李唐盛世亦将难以实现。试略言之。魏晋南北朝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有新发展。儒学独尊之势降落，玄学、佛学、道教互相争鸣，桎梏既除，思想解放，此其一也。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尤其印度文化随佛教而东传，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语言、自然科学等，均发生积极之影响，此其二也。孙吴、东晋、南朝在江南立国，前后约三百余年，永嘉之乱，中原士庶纷纷南徙，江南大量开发，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南移，此其三也。南北两方，尤其是北方，各民族间长期之斗争与融合，为中华民族增加新鲜血液，此其四也。此时期中酝酿出数种行之有效之制度，如均田制、府兵制、中央政府中之三省制，此其五也。凡此五端，皆深远影响唐代而促成其国势昌盛，文化繁荣。陈寅恪先生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阐释魏晋南北朝诸制度之影响隋唐者，持论甚为精辟。滋衍补充，责在后人。治史者固贵专精，然亦重通识。余指导攻读魏晋南北朝史博士研究生时，恒号召其上溯先秦、秦、汉而下贯唐、宋，始能对魏晋南北朝史有更深邃之透视与理解，亦此志也。

至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之前途发展，朱君认为，应从下列三领域进行开拓。第一，关于社会生活方面。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风俗礼仪、宗教迷信等，所谓“大文化”部分，内容极为丰富。第二，地域经济文化方面。我国幅员广阔，各地差异甚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南北经济文化有差异，即同在南方或北方，不同地区之经济文化亦各具特色，宜分别深入研究。第三，各种政治制度方面。如中央政权之决策审议执行之三省制，军队之统率与指挥系统，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关系等等。以上三种领域研究之成果，不仅有助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之深入，而对于当前政权建设、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亦将有借鉴作用,并可充实中外文化交流之内容。朱君治学,既能探索隐微,又能高瞻远瞩,其所拟议之三项开拓计划,均中肯綮。余祝朱君继续精进,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能呈献更辉煌之成绩也。

一九八九年九月,缪钺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

目 录

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	1
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	36
魏晋南北朝的中医外科医术·····	64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	79
魏晋南北朝阶级结构试析·····	102
魏晋南北朝政界名人成才年龄结构剖析·····	141
北魏末军户制的衰落·····	158
梁末陈初豪强酋帅的兴起·····	193
代北豪强酋帅崛起述论·····	216
两晋南北朝的官俸·····	246
两晋南北朝官员致仕刍议·····	270
魏晋南北朝南北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	302
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	337
孙恩徐道覆起义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	357
南朝少数民族概况及其与汉族的融合·····	402
关于唐宥之起兵的性质·····	437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若干史实的辨析·····	457

关陇起义第二次泾州大战及攻克潼关考·····	482
诸葛亮躬耕地析疑·····	492
《隆中对》与夷陵之战·····	507
论谢安的政治军事业绩·····	530
萧梁名将陈庆之战绩考实·····	557
后记·····	582

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

魏晋南北朝特定的时代条件,决定了该时期的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绚丽多姿,异彩纷呈。可以说,我国古代文化从春秋战国以来,又一次出现了大变革时期。特别是魏晋玄学的产生,国内各民族大融合的形成,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印度佛教佛理的广为流传等新因素,对隋、唐以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将魏隋间中国文化同汉、唐文化相比,揆其大要,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自觉趋向型文化特征^①

黄巾大起义促使东汉大帝国的瓦解,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儒家伦理纲常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的思想从儒家名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因而人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精神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汉末至隋约400年内,基本上处于长期分裂割据(西晋统一至八王之乱只有11年),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那时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家族,每一个社会政治集团,每一个割据政权,要求得生存、自立和发展,都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努力,也即发挥人才的

^① 汤用彤先生用“自由精神”语。参见《魏晋玄学论稿·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中华书局1983年版。

优势,从而有利于个人聪明才智的充分显示。加之东汉统一帝国的瓦解,人们热衷于寻求重新统一和治国的理论。这些时代条件不仅使得各类人才辈出,而且促使学术思想界儒、玄、墨、名、法、纵横、佛、道以至兵家都应时而出,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所谓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①。

当时从政治斗争到思想理论斗争的许多主张,都与儒家名教相悖逆。早在曹操与袁绍等联兵反对董卓时,二人各自发表如何夺取最后胜利的意见,曹操便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②所谓“智力”,指人的才能,“道”乃指由人制定的适时而变的各种方针政策。曹操认为在群雄逐鹿中要取得胜利,只有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因此,他多次下令主张“唯才是举”,不仅“盗嫂受金(者)……吾得而用之”^③,甚至“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④,皆可录用。清谈名士嵇康不仅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⑤,还公开宣称他“非汤武而薄周礼”^⑥。鲍敬言从老庄任自然的思想出发,针对儒家所谓“天生蒸民而树之君”的君权神授说,揭示国家、君臣以及政治制度的出现,都是暴力和征服的结果,也是压迫、贫苦和战争的根源。鲍氏对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讲的“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

① 《隋书》卷三二、三三、三四、三五《经籍志》所录当时极其丰富的各家著述,最能反映此点。

② 《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本纪》建安九年。

③ 《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本纪》建安十五年《令》。

④ 《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本纪》建安二十二年注引《魏书》。

⑤ 《晋书》卷四九《嵇康传》。

⑥ 严可均辑校《全三国文》卷四七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①,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著名的“无君论”^②,反对国家、君臣、政治制度的存在。皇帝绝对权威的树立,如果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 221 年)算起,到鲍敬言所处的两晋之际,已有约 540 年的历史。鲍氏对封建专制的核心君权的彻底否定,尽管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但他在理论上的勇气,反对政治压迫的实质,以及在思想意识上趋向自觉的精神,都是值得赞许的。

与“无君论”思想相辉映的,乃是“神灭论”和“笑道论”。从三国时孙吴虞翻的“无仙说”^③,西晋阮瞻、阮脩的“无鬼论”^④,到刘宋范晔的“死者神灭”,“天下决无佛鬼”^⑤,再到范缜的“神灭论”^⑥,北周甄鸾的“笑道论”^⑦,均在于反对佛道教义欺骗人民,及其维护封建统治的神仙鬼神学说。特别是范缜的《神灭论》把我国古代唯物论思想推向顶峰,它有利于人们思想意识的趋向自觉,有利于科学的进步。上述对封建统治理论的核心名教禁锢的突破,以及对封建统治政权核心君权的否定,以及古代唯物论思想的发展,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人们思想的一次相对解放,从而促使人们的文化心态向自觉趋向型发展。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妇女受压迫最深,因而她们的社会地位及其思想观念,最能说明当时人们思想意识的自觉趋向程度。东晋葛

① 严可均辑校《全三国文》卷四六阮籍《大人先生传》。

② 《抱朴子·外篇》卷四八《诘鲍篇》。

③ 《三国志·吴书》卷一二《虞翻传》。

④ 《晋书》卷四九《阮籍传附瞻传、脩传》。

⑤ 《宋书》卷六九《范晔传》。

⑥ 《梁书》卷四八《范缜传》。

⑦ 《广弘明集》卷九《笑道论》。

洪曾生动地描绘了两晋南方妇女的社会生活,说她们离开织机,走出厨房,拜亲访友,周游城邑,游戏佛寺,观赏渔猎,登山临水,出境庆吊,途中有说有笑,有时甚至举杯痛饮,引吭高歌^①。这里表现出来的妇女的社交活动和社会地位,似乎同男子没有多大区别。北齐颜之推在描述北齐国都邺城一带妇女的社会地位时说:“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②邺城一带妇女居然成为一家之主,她们不但操持家务,甚至还参预为子求官,为夫诉屈等政治活动,足见其社会地位颇高。北朝在东魏孝静帝时(534—550年在位),元孝友上表云:“妇人多幸,生逢今世,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③孝友上表意在反对一夫一妻制,显然是夸张之词,但既然是在上表中所述,当不会全为妄言。北朝妇人主持家务,参预政治活动,以及反映妇女地位提高的一夫一妻制在封建统治最上层偶有出现,显然是鲜卑习俗对北朝社会的影响。实际上,它反映了北朝民族融合这股历史主流,对当时北方文化的深刻影响。

由于儒家男尊女卑观念受到冲击,少数民族风俗的习染,妇女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她们有了掌握文化的机会,因而当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诗人、作家、书法家、音乐家、舞蹈家、歌星以及深通儒家经典的女文人学士。她们写下了诗、赋、谏、铭、颂、书、疏等传

① 《抱朴子·外篇》卷二五《疾谬》。

②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第一《治家》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这里说江东妇女“略无交游”,恐在衬托北朝妇女地位之高,或南朝末南方妇女地位有所变化。

③ 《魏书》卷一八《临淮王谭附曾孙孝友传》。

于后世。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两晋妇女有文集者计 12 人,共 40 卷;十六国前秦妇女有诗文集者 1 人共 1 卷;南朝妇女有文集者计 7 人,共 39 卷;1 人注书 7 卷。此外,有姓无名,标某氏撰文集者计 37 人,共 106 卷,其中应有一部分为妇女所作^①。前秦韦逞母宋氏,其父授予《周官》音义,她传授其子韦逞,逞为前秦太常卿。苻坚视太学,“悯礼乐遗阙”。博士卢壶推荐韦逞母亲说:“宋氏世学家女,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自非此母无可以传授后生。”^②苻坚封宋氏为宣文君,特派遣太学生 120 人前去宋氏家立讲堂受业,使《周官》学复行于世。南朝刘宋时,吴郡妇人韩兰英,颇有文辞,擅长作赋,受宋明帝赏识,“用为宫中职僚”。齐武帝封为女博士,“教六宫书学,以其年老多识,呼为‘韩公’云”^③。北魏清河崔元孙之女,为房爱亲之妻,“历览书传”,亲授其子景伯、景先《毛诗》、《曲礼》经义,“并为当世名士”。景伯后为清河太守;景先学识精博,为太学博士兼著作佐郎,撰《世宗起居注》^④。

妇女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并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因而其思想观念也趋向自觉,从而妇女出外游学、步入仕途、从军、自由选夫等为封建伦理纲常所不容的事例,在魏晋南北朝时有出现。

南朝齐代东阳郡(与会稽郡接壤)有位精通文义,善弈围棋的女子娄逞,不甘心受封建礼教的索缚,决心走上社会干一番事业。她打扮成书生,只身到京城建康,“遍游公卿,仕至扬州议曹从事。

① 见《隋书》卷三二、三三、三四、三五《经籍志》。

② 《晋书》卷九六《列女·韦逞母宋氏传》。

③ 《南史》卷一一《后妃传上·武穆裴皇后传》。

④ 《魏书》卷九二《列女·房爱亲妻崔氏传》,卷四三《房法寿传附房景伯、房景先传》。

事发(齐)明帝(494—498年在位)驱令还东”。娉逞着妇人服而去,临行叹曰:“如此之伎,还为老嫗,岂不惜哉。”^①据清雍正十一年修《宁波府志》卷三六《逸事》载,梁祝故事发生在东晋谢安执政时,梁山伯为会稽山阴人,祝英台为会稽上虞人。祝女扮男装,“游学与梁共读”。从府志所记梁祝故事情节详细,以及与其并列的前后史事属实看,再参以娉逞女扮男装至京城从政事,梁祝故事发生在东晋,应有所本。北朝《木兰词》所描述的乃是一位闺门女子女扮男装,代父从军10年之久的故事^②。这是当时战乱特别纷繁(尤其在北方),妇女从军参战现实生活在文艺上的反映^③。当时妇女的婚姻,也出现了一些自由选择夫婿的事例^④。至于男女离婚^⑤,以及夫死妻嫁,国家法律似乎是允许的^⑥。直至隋代,才正式下令有官品者:“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⑦一般无官品者

-
- ① 《南史》卷四五《崔慧景传》。又见《太平广记》卷三六七《妖怪》九。
- ② 《木兰词》产生的时代,参考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 935 页注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③ 参阅《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本纪》注引《魏书》、卷一六《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卷一七《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宋书》卷七四《沈攸之传》;《梁书》卷三《武帝纪》下;《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 ④ 《晋书》卷四二《王浚传》,卷四〇《贾充传附谧传》;《北齐书》卷九《神武娉后传》;《晋书》卷九六《烈女·周颙母李氏传》。
- ⑤ 《晋书》卷四九《羊曼传附弟聃传》,卷九一《儒林·王欣传》,卷七九《谢安传附珣传、附逸传》,卷四三《王戎传附王衍传》。
- ⑥ 《世说新语》下卷上《伤逝》第十七《庾亮儿遭苏峻难遇害》条。《魏书》卷九二《列女·张洪初妻刘氏》,《列女·刁思遵妻鲁氏》;《宋书》卷九一《孝义·徐元妻许氏传》;《南史》卷五五《孝义·韩灵珍妻卓氏传》。
- ⑦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夫死妻嫁，自然不在此例。史载，魏晋时“初作屐（木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圆者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至太康初，妇人屐乃头方，与男无别”^①。这里所谓“圆者顺之义”，是指妇人从夫的意思，所谓“别男女”，乃指儒家伦理分别男女，使尊卑有序。西晋太康（280—289年）初，妇女穿屐由圆头改为方头，与男子无别，实际上这是指妇女要求与男子平等的一种自觉意向在穿着习俗上的反映。所有上述妇女自觉趋向的观念和行为，表现了社会风尚给妇女的影响，其实质是妇女争取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它从最深层次上显示着儒家名教观念的淡薄，人们文化心态上趋向自觉的程度。

当然，魏晋南北朝人们的文化心态，虽然出现了一种反儒家名教的自觉趋向，几乎表现在各个文化意识领域，但妇女从整体上说，依然处于男人的从属地位。同时儒家名教毕竟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核心，在人们的潜在意识里，尤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仍起着支配的作用。

再从学术思想领域的高层次推求，前贤所揭示的当时百家争鸣中出现的所谓儒玄合流，佛道互补，儒、佛、道相互对抗，而又互相渗透，以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鲜明对立，这种文化学术思想领域的对抗、交融和繁荣，本身既促进了人们文化心态自觉趋向的发展，也标志着我国古代哲学和宗教走向成熟的阶段。特别是在魏晋最高知识层“自由精神”影响下，玄学以对儒家名教质疑而兴起后，给人们的思想境界带来了一系列新变化。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

^① 《晋书》卷二七《五行志》。